

史坛纵论

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编
重庆出版社



11(2)/60

1198163



史坛纵论

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 编

RD06/11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重庆



责任编辑：冯克焕

秦树艺

封面设计：金乔楠

史坛纵论

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99 千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4,500

书号：11114·48

定价：0.45元

目 录

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	何兹全 (1)
史学评论与马克思主义.....	赵光贤 (5)
从做翻案文章说起.....	金冲及 (8)
历史与现实.....	胡如雷 (11)
研究历史要有历史感.....	丁伟志 (14)
史学研究要克服简单化倾向.....	赵矢元 (18)
谈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	李桂海 (21)
略谈史识的形成.....	蒋大椿 (24)
功夫与史学.....	陈可青 (28)
考据与历史研究.....	宋衍申 (31)
史学方法论的“引进”要慎重.....	刘修明 (34)
比较研究中的一点想法.....	绍 云 (37)
谈批判继承.....	赵光贤 (40)
史家·史识·感情.....	宋衍申 (43)
加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林甘泉 (46)
军阀史也应该认真研究.....	孙思白 (50)
加强史学评论.....	文 海 (53)

希望有更多的新型断代史问世·····	田居俭 (56)
要重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	管成学 (59)
党史研究的四个层次·····	王桧林 (62)
史源学不可不讲·····	陈祖武 (65)
给西方史学史一席之地·····	张广智 (68)
不能轻视史学园地中的“小儿科”·····	凤 麟 (71)

基础知识与专史研究·····	张舜徽 (74)
基本技能小议·····	来新夏 (76)
谈学派·····	苏双碧 (79)
史书体裁的多样性·····	瞿林东 (83)
应该认真掌握和钻研史料·····	纪 程 (86)
学术讨论中的概念要有确定性·····	卢中平 (89)
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	吴怀祺 (92)
历史考察 大有益处·····	阎守诚 (95)

写出历史人物的个性·····	王思治 (98)
生动一些 形象一些·····	李文海 (100)
史学的活力·····	瞿林东 (103)
提倡短文 力争写短·····	杨天石 (106)
加强历史的形象研究·····	朱宗震 (108)
史学的魅力·····	晁福林 (110)
说“话”	

——有感于历史文章的写作问题·····	尹韵公 (113)
治国安邦 史家有责·····	许在全 (116)

美哉，为史以德也！	肖 黎 (119)
不薄名人爱新人	宋德金 (122)
“近亲繁殖”与“远缘杂交”	
——培养史学人才的一个重要问题	赵忠文 (125)
重视和支持青年史学工作者成长	陈君聪 (128)
评价历史人物宜用“阶段论”	降大任 (131)
评价历史人物的“阶段论”及其它	邓传淳 (134)
“阶段论”不能取代从总体评价历史人物	陈其泰 (137)
再谈“阶段论”	降大任 (140)
评价历史人物亦宜用“方面论”	黄 椿 (143)
评论历史人物要恪守“历史条件论”	郭卿友 (146)
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方法论	舒 秦 (149)
后记	(152)

推进中国史研究的两点建议

何 兹 全

解放后三十多年，中国史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但有一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使得许多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得不到真正的理解。任何社会历史的一点、一线、一个部分，它的性质是受历史发展长河制约的，同时又要受它所产生的社会的制约，因为这个社会是它所以产生的根源。如果连这个社会的性质都还弄不清楚，对由它产生的社会事物，就很难理解得清楚、正确。

如何推进当前中国史研究工作，使古史分期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我提出两点建议：

一、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二、学习世界史，特别要学习那些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

我认为这两方面的学习，对推进当前中国史的研究是有益的。

斯大林说过，封建生产关系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斯大林的话对中国史研究有很深影响，它使我们往往一看到有农奴或依附民出现，就认为这是封建社会。但是，我们学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的著作，就看到，在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阶段，乃至文明时代的初期（即阶级社会的初期），农奴制就出现了。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70页）恩格斯也说：“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31页）。

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把农奴制的出现说成是封建社会，相反，他们都明确指出，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有深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主要是从欧洲史概括出来的。因此，要深入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就要学习欧洲古代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古日耳曼史）、欧洲中世纪史，乃至日本史、印度史等等。同时，研究世界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国各民族历史的详细的具体的面貌，有助于我们和中国历史作比较研究。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提到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雅典贫民被贵族兼并的情况时曾说：“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

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作奴隶，以偿还债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27—128页）

这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雅典的社会情况。这是一个什么社会？我们可以想想。拿我们今天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知识来分析这个社会，大约不认为是封建社会，就是奴隶社会。社会已分解为贵族、被保护民和奴隶等阶级。农民因贫困、债务关系不得不把土地出售给贵族。收获物的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自己只保有六分之一。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不是封建社会吗？但农民的子女被卖作奴隶，甚至自己也被卖作奴隶，这不也可能是奴隶社会？

然而，这时的雅典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正在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至多这是阶级社会的初期。

就这点来说，我想我们学习点世界史，作点对比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史，认识中国史，是会有益的。

再就古罗马史来说。

公元前八至七世纪，是古罗马史上的“王政时代”。王政时代的罗马，已是氏族社会末期，由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但氏族组织仍是社会的基础组织。罗马当时有三百个氏

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大氏族，十个大氏族组成一个部落，罗马有三个部落。氏族内部已出现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出现贵族和一般氏族成员的对立。氏族贵族利用特权窃夺公有土地为自己的私产。贫穷破产的氏族成员依附贵族，成为受贵族保护的“被保护人”。被保护人从贵族那里取得土地，对贵族服役和负担一定的义务。贵族、被保护人以外，还有平民和奴隶。

被保护人是不是农奴、隶农或依附民？有些象，但似乎没有人这样称叫他们，也没有人说古罗马在古代社会之前有过封建制度或封建社会，至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人这样说过。

我想，学习古代罗马史，和中国古代社会作点比较研究，对我们学习中国历史，认识中国历史，是有益的。在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学习世界史，把中国史放到世界中去研究，从比较研究中开扩眼界，认识中国历史，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想法。

史学评论与马克思主义

赵 光 贤

纵观我国史学史，不难发现史学评论对于史学研究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史评名著，都曾给后世史家以极大影响。他们不仅以敏锐的目光匡谬正误，而且对诸如史料鉴别、修史方法、史实判断、人物评论、史家修养等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不可能解决史学研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正如列宁所说，他们“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开始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史学领域，建立了历史唯物论，并最先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实现了社会科

学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历史学真正地成为一门科学。因此，我们的史学评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达到一切封建史学评论和资产阶级史学评论所远远不能企及的水平。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虽能展开批评和反批评，取得不小的成绩，但是无庸讳言，不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上，还是在史料的解释和使用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只是就事论事，提不到理论的高度；有的不从史实出发，只满足于摘取经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语，作为评论的标准，或作为自己主张的根据，因而不免多少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原意。这些倾向亟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予以纠正。

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要了解革命导师对于某一问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导师总是在精深地研究和总结了当时人们对人类的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之后，才提出自己的结论的。而且，每当有新的材料出现时，他们又总是及时地加以改正，吸收其合理部分，使之不断深化和发展。举例来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依据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对于原始社会及其后的阶级社会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认为这是亚细亚所特有的。后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不断取得新的知识，如哈克斯特豪森、毛勒，特别是摩尔根的书相继出版，大大丰富了这方面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研究了这些最新成果，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几

乎全世界到处都有，这样，再用原先的提法就不合适了，所以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就不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了。再如，马克思原先认为古代东方是没有私有制的，后来他看到了俄国学者科瓦夫列斯基的著作，发现在印度的某些地区确实存在着私有制，于是就修正了原来的看法。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人类认识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如果我们不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结论当作凝固的、僵死的教条，死死地抱住不放，并且不是全面理解，而是抓住一些词句，为我所用，恐怕对马克思主义就会越争论越远离了它，那是很危险的。比如有的外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就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硬说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这是完全不顾中国历史事实的胡说，应当加以批判。

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在史学评论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以至今天还不能完全肃清其影响。“左”的思想常常表现为教条主义。研究问题，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经典作家的理论，甚至从几句语录出发，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统统纳入简单的模式之中，这样搞历史评论恐怕不免南辕北辙了。

总之，史学的繁荣离不开史学评论，而史学评论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里有理论问题，也有史料问题。因此，史学工作者只有在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并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把我们的史学评论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从做翻案文章说起

金 冲 及

这几年来，史学领域里的翻案文章做得很不少。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它表明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的思想活跃多了。有些传统说法本来不符合历史实际，这种案自然要翻。有些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了这样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考察来作比较，也可以使思想更开阔些，使问题看得更全面些、更接近实际些。有些重要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果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不必急于求同，强求一致，这对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有好处的。也有少数文章，我觉得缺点比较多。因此，提出几点想法，以供参考。

第一，历史研究首先要求真，要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各种议论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而求真是要花功夫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记载又往往不尽一致。有些事情当时就众说纷纭，今天更不容易弄得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详尽地掌握材料，细心地加以研究，慎重地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来。这里很用得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如果经过反复的研

究,事实的确是这样,那就不管你是什么权威的结论、传统的说法,统统可以推翻,断然用新的结论去代替它。反过来,如果没有首先花力气去细心地研究事实,从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引出结论,而是灵机一动,或者单凭推理,去想出一些新的提法来,再摘引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历史资料来补充原已构成的框架,这种文章主论纵然新奇,也是难以把科学推向前进的。

第二,客观事物总是复杂的,有着若干不同的侧面。研究历史,就要逐个地考察这些侧面,然后加以分析: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并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可以减少片面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要得出新的结论时,更需要从反面或其它角度多想想:还有没有哪些被自己忽略了的因素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看法会不会有片面的地方?别人读后会提出什么疑问或责难?经过考虑,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自己的看法站不住,那就不管原来花了多少力气,也只得毫不可惜地放弃;二是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是对的,但不全面或谈得太笼统、还缺乏说服力,那就应该补充或修改,使它更充实更完善;三是自己的看法确实站得住脚,经过反复推敲,心里就比较踏实,较能立于不败之地。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某种新的想法先固定下来,然后一股劲地只往这条路上想,越想理由越多,体系也仿佛越来越完整,作茧自缚,背后却留了个大窟窿。结果,别人一攻就倒,自己回头再看也会爽然若失。

第三,写文章自然要有新意。不能被前人现成的结论束缚住自己的头脑,但也要对前人的劳动采取尊重的态度。在

研究一个问题时，总得先了解一下过去在这方面已作过哪些研究工作？他们得出这些结论是怎么考虑的？其中是否有可取之处？再同自己细心研究事实后得出的结论相比较。如果前人的结论完全不符合实际，当然只能坚决推倒，不必有什么顾忌。如果前人说法中有可取之处，还得加以吸取。如果前人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弄清一些问题，作出某些补充，应该说是对科学的贡献。并不是只有另立新论，才算具有创见。

说了这么多，不是想立许多清规戒律来束缚手脚，沮别人方新之气，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未必都已做到。但我想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历史研究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不断取得更加实在的进展。多花点功夫，看起来好象慢一些，其实总的步子倒会更快一些，新的创见才会开花结果，更具有生命力。这些，可以说都是自勉的话。“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有片面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

历史与现实

胡 如 雷

多年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都在围绕历史科学如何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先后提出过“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等口号。我个人觉得，口号如何提法，并不十分重要。只要认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大量搜集到的史料，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就可以了。这样做是否就意味着为社会主义服务呢？我觉得不但可以这样说，而且应当认为这是主要的服务方式之一，理由有二：首先，通过史学论著在广大读者中促进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建立，这是最好的服务。因为读者在学习历史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坚信全人类的历史必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时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树立得牢固了。其次，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在同资产阶级史学家争夺史学阵地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因为这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